

中国
古代
名家
作

金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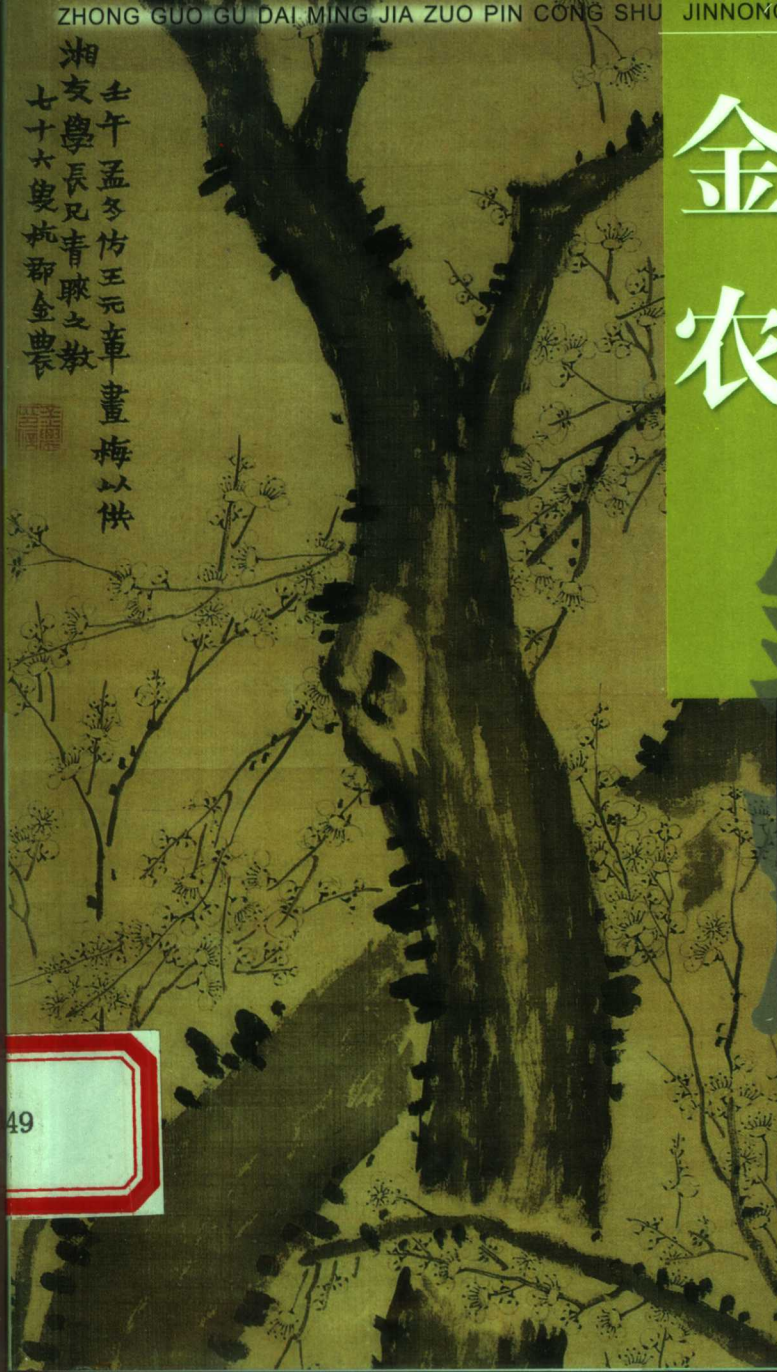
品
从
书

人民美術出版社

壬午孟冬仿王元章畫梅以供
湘友學長兄青睞之教
七十六叟杭郡金農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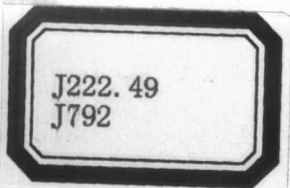
49



ZHONG GUO GU DAI MING JIA ZUO PIN CONG SHU JINNONG



郑州大学 *04010303240H*



-41

金 农 金 農

中国
古代
名家
作品
丛书



人民
美術
出版
社

J222.49

J792

Gay 64/0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农 / (清) 金农绘. — 北京: 人民美术出版社,
2004.6

(中国古代名家作品丛书·扬州画派)

ISBN 7-102-03043-6

I. 金… II. 金… III. ①汉字—法书—作品集—
中国—清代②中国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清代
IV. J222.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49302 号

中国古代名家作品丛书

金 农

出 版 者: 人民美术出版社

(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100735)

策 划: 王玉山

责任编辑: 于瀛波 赵小来

装帧设计: 于瀛波

责任印制: 丁宝秀

制 版: 北京燕泰彩视印刷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: 8

印数: 1—3000

ISBN 7-102-03043-6

定价: 34.00 元

金农的书画艺术

萧燕翼

历史上有许多扑朔迷离的人和事，令研究者殚精竭虑，必欲澄清而后快。然而，愿望也许始终只是愿望，历史的尘埃往往会埋掉许多解开猜想的途径。尽管如此，研究也不会是徒劳的，至少能贴近那必欲澄清的谜底。妇孺皆知的清代画史中的“扬州八怪”，其中久负盛名者金农就是一个历史迷雾中的人物，他的书画作品遍天下，然而据古人的记载和今人的研究，都曾指出他的绘画作品多是他人的代笔之作。为什么会是这样？他到底会不会画画？倘会画，庐山真貌是什么样？一个著名的古代书画家，会让人提出这样的问题，岂非咄咄怪事，但这又是画史研究者必须澄清的怪事。文献的研究是必须的，作品的研究更是其基础。亲笔与代笔的鉴别，是文物鉴定中的事，而文物鉴定的科学研究之途，主要的仍是比较分析的鉴定方法。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掌握大量的作品，集中地比较分析，以期言之有物、有据。本文即在此基础上，先期做些抛砖引玉的探索。并让世人认识金农这位古代书画家其人、其艺。

一、金农其人

金农字寿门，一字司农，康熙二十六年丁卯（1687）三月

二十七日，生于浙江仁和（今杭州）钱塘江上，故日后有一常用的书画印章“生于丁卯”一印，以记其生年。据《冬心先生集·自序》记其家：“有田几棱，屋数区，在钱塘江上。中为书堂，面江背山，江之外，又山无穷，若沃洲，天姥、云门、洛思诸峰，群欲褰裳涉波昵就予者。”看得出，这是一个小康而闲适的家庭。地杰而人灵，又有这优游闲适的家庭条件，果然易出一代灵怪的名士，金农正是“浙西三高士”中的名士之一。因之，金农在“扬州八怪”中是别号最多者，正是以“名”而自鸣的缘故。别号中用得最多的、最响亮的是“冬心”、“冬心先生”，自云：“丙申病疴江上，寒宵怀人，不寐申旦，遂取崔国辅‘寂寥抱冬心’之语以自号。”^①其次“稽留山民”一号，据《金农年谱》中释，稽留山即浙江杭县天竺山，唐尧时许由隐居之所，山上多蝉，蝉鸣“稽留”之声，与浙语中“许由”字音相类，金农以之为号，正是仰慕前贤之意。又其父于曲江别业处有耻春亭，因号“耻春亭翁”，以示对先人的追念。又因其酷嗜金石，富藏砚石，故有“百二砚田富翁”一号。中年以后嗜佛，别号“心出家庵粥饭僧”、“如来最小弟”。此外还有“曲江外史”、“龙梭仙客”、“二十六郎”、“纸裘老生”等别号，亦均有各自不同的寓意。这些可以让我们从不同侧面，了解金农的身世、爱好、思想以及人生经历中不同阶段的理想、际遇等。但这位历经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代的“三朝老民”，不曾料想到他会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（1763）秋九月，以贫病相加的衰暮之年“殁于扬州佛舍”。^②亦不曾料及，在其期有所遇的一生中，在无奈中，“和葱和蒜卖街头”的书画生涯，却使他成为了“扬州八怪”中的人物和古代书画史中著名的书画家。

综观金农的一生，当以围绕着乾隆元年（1736）清廷征、开博学鸿词科，并因之造成其一生的重大转折一事，将其人生基本划分为两大阶段。即中年以往的投师问友，“笔耕墨耘”、“游食四方”的“期有所遇”的早、中期经历，以及自乾隆元年以后，主要寓居扬州和以书画为生涯的中、晚年经历。可以说，金农一生中的“期有所遇”是伴随着博学鸿词科的结束而破灭的。这里虽有着一个是他应试未第，还是被荐而未试？或者干脆是没有获得合法的被荐举资格，因之也就不可能参加考试，这一学者们所争论的迷题，但不管怎样，清廷举行的第二次博学鸿词科，给金农带来的结果不是一官半职，而是使其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书画创作的生涯。下面略述其一生主要经历，以期了解一些促其步入书画生涯的内因外果。

青年时期的金农已负诗名，20岁时曾访浙江萧山毛奇龄，所作诗得到了这位前辈学者、诗人的激赏。二十一二岁的两年中，投师并读书于吴门何焯家中。并先后与同辈的丁敬、厉鹗、鲍珍、杭世骏、周京、陈撰、汪沆诸人缔交，结为一生挚友。在“扬州八怪”中，金农的修养最为广博，不仅诗文创作早露才华，又精擅金石碑版鉴赏，擅长八分书、治印、刻砚，最后又晚负画名。所有这些，与其早年的投师交友密切相关。按金农所师的何焯，字屺瞻，号义门，长洲（今苏州）人。其家有丰富的藏书，本人则博览群籍，长于考订，尤精于校勘古碑版，是当时著名的学者。他还擅长书法。喜临摹晋唐法帖，擅楷、行书，与姜宸英、汪士鋐、陈奕禧并称康熙间的四大书法家。由此可知，金农读书其家，所受影响是多方面的，尤其是酷嗜金石碑版和书法的擅长。金农青年时期缔交的一生挚友，当以同乡里、

比邻居，又与其并称为“浙西三高士”的丁敬为最。丁敬字敬身，号钝丁。工诗文，造语奇崛，尤精篆刻，治印开创“浙派”为“西泠八家”之鼻祖。又擅画梅。金农与之相契，而其擅治印刻砚和绘画中的善画梅，亦是相互间的影响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他的这些挚友，大都不热衷科举仕途，其中只鲍珍做过浙江长兴县知县，彼此间只是以文会友，激赏于金石、书画间。至于杭世骏高中乾隆元年的博学鸿词科，官授翰林编修，以及厉鹗的应试未第而返，那已是后话了。所有这些对金农的影响是重要的，尤其是其师何焯的人生经历，给金农树立了一种希冀中的模式。何焯起初并没有走科举的仕途之路，然以其学识，经人荐举而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，直接进入内廷的南书房。这对于读书的士人来说，是一种最高的礼遇和认定。因其没有科举功名，有违清王朝选拔官吏的体制，因之皇帝特赐何焯以举人的功名，以便能够参加科举会试。不料会试落第，又再次蒙恩允许参加殿试，结果得中二甲三名进士，才算是有了正途出身的资格。金农在投师何焯之际，何焯正担任着皇八子胤禩的老师，被认为是胤禩身边军师式的人物。老师遭逢的特殊际遇，以及职任皇八子的老师，无疑会给金农带来一种希冀，当然是希冀老师极有可能的升迁，以给自己奠下荐进之途。并能仿效老师那样，既能保持士人的清名，又能荣登高位。这不仅仅是一种推测，在金农后来的经历中有着许多明显的迹象，是可以证明的。

金农一生好游历，也就是汪士慎赠诗中所说：“诗人情性惯离家。”除情性喜游外，在其广阅历中还抱着“期有所遇”的实际目的。自30岁始，他曾数度出游，时间最长、路途最艰辛的当属山西泽州之行，此行从雍正三年乙巳（1725）的春天开始，

“渡扬子、过淮阴、历齐、鲁、燕、赵而观帝京，自帝京趋嵩洛，之晋、之秦”。^③最后，用金农的话来总结，称作“无所遇而归”。就广阅历而言，当然不能说“无所遇”，因为他的足迹深入到了晋、秦之地，饱览了中原及北地的山水与风土人情，这对他的艺术修养不无裨益。而且他结识了京师一些权贵人物以及泽州的陈壮履。按陈壮履，字幼安，康熙名臣陈廷敬之子，曾官翰林侍读学士。当时正罢官乡居，而金农在陈家一住三载。陈壮履的仕途坎坷，正触动了金农的心事。就在此行中，金农于雍正三年首游京师，结识了同师何焯而有同门之谊的徐葆光，时位康熙壬辰科的探花郎，当时职任翰林编修。又结识了专管掌院学士事的清贵族中文士阿金，以及当时供职吏部的清代书法家王澐诸人。毫无疑问，这些都是有可能引荐或有机会直接荐举金农的人物，但看来他们都没有这样做，因为雍正皇帝显然在即位之初，正忙着铲除异己，安定统治内部的诸事宜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京师之际，他曾给王澐写过一信，信中说：“洪容斋先生云：予甫十岁时，过于州白沙渡，见岸上酒家败壁间，有人题诗一篇，‘一点青油污白衣，斑斑驳驳使人疑，纵饶洗遍千江水，争似当初不污时’。三复此诗，殊有讽意。农今年浪游京师，淄尘染素，得毋类似乎？”^④此札正逗出他首游京师即心有所冀的活脱心态。这里暴露了金农“期有所遇”的隐衷，也暴露了他在性格上的矛盾特点，既想保持读书人的清名，又心想着能有老师那样的际遇，最终只能是无所遇而归了。归来后，他开始着手出版自己的第一本诗文集《冬心先生集》，并自序道：“念玉溪生（李商隐）有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誓愿，因亦誓愿五十之年，便将衣衲入林，得句呈佛，以送余生。”并特意申

明30岁一场大病之后，取句“寂寥抱冬心”，以为自号的原因，以表十余年后依然是冬心一片的情怀与决心。从《冬心先生集》的诗集看，金农主要的依然是诗才，在诗歌创作中取得过不菲的成就，为日后转为绘画创作，奠下了构思卓然的基础。当然，既已结为诗集，依然断不了入世的凡心。果然在其誓愿50岁“衣衾入林”之时，又牵动了其本归寂寥的“冬心”。

《冬心先生随笔》中记：“雍正十三年，天子开鸿博之科，明府荐予姓名于节钺大夫，因赴京师，旋返杭州。”又《冬心先生续集·自序》记：“乾隆元年，天子开博学鸿词科，明府荐予姓名于节钺大夫，遂到都门。”两条所记，其实是一回事，即雍正十三年（1735），皇帝下诏举办继康熙己未科的第二次博学鸿词科。也就是让一些未经科举正途的博学鸿儒，经荐举直接赴京入试，考中后即可获得与科举正途出身的进士们同等身份，并授以一定的官职，是清廷通过“举逸民”而网罗士人的一种手段。然博学鸿词科未能如期举行，因为各地荐举上来的人很少，且同年八月雍正皇帝就死去了。继位的乾隆皇帝紧接着又下诏令，要求各地继续荐举，并期于一年内到京，然后择期举行，金农所言：“明府荐予姓名于节钺大夫”，研究者一般皆认为是指归安县令裘鲁青，荐举金农给浙江学政帅念祖。而金农在被荐举之后，曾上书帅念祖加以推辞。被荐、辞荐与金农所言的“遂到都门”，以及有关记载中的应试、未就等说法，显然有含糊不清之处，于是引起了研究者们的纷议，是辞荐、是应试未第，还是什么别的？可以肯定的是，金农确实在乾隆元年到了京师，而且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《冷香清艳图》一作，金农自题中明确说是“乾隆元年，应举至都门”。但问题并不这样简单，因为在

几种有关这次博学鸿词科的文献记载中,包括落第的人名记录,均没有金农其人。综合有关情况,极有可能是,金农的被荐举,尚不具备合法的、完备的资格。据《清高宗实录》记,乾隆皇帝诏谕:“凡在内大臣,及各直省督抚,务宜悉心延访,速行保荐,定于一年之内齐集京师,候旨廷试。”具体的规定是,凡在京三品以上满汉大臣及在外督抚会同该学政才有资格推荐征士。为此,浙江总督程元章在雍正皇帝下诏后,即已会试全浙之士,选荐18人,其中包括金农的好友杭世骏、厉鹗,但并没有金农。倘金农所言的“荐予姓名于节钺大夫”,是指浙江学政帅念祖,没有总督程元章的认可,则不符合清廷的规定。那么金农赴京之前,同样也没有得到合法的荐举,而有待京师权贵人物的直接荐举。有人认为,节钺大夫可能是京师中的某权贵。据当时著名学者全祖望记:“初,浙中学使帅公兰皋(帅念祖),尝以寿门应词科之檄,力辞不就,而蹇驴之都下。或问之,则曰:吾将欲观征车中人物果何等耳。数月,囊中金尽始归。”^⑤这是一种说法,但极可能的真实情况是,他仍抱着一线希望,希望京师中的故友和结识的权贵人物再为力荐。在《冷香清艳图》中,他提到至京师后,“与徐亮直翰林,过张司寇宅”。徐亮直是与金农有同门之谊的徐葆光,经徐葆光引荐,得识雍、乾名臣张照,因任刑部尚书而被称作张司寇。可惜的是,张照当时正因坐事而被免职,虽然他极赏识金农的诗文、书法,并曾屏骑访金农于寓居,也不可能去荐举金农了。博学鸿词科的殿试,是乾隆元年九月二十六、二十八日,在紫禁城中保和殿举行,倘金农是应试而未第,能够有机会一瞻禁城中的宏伟殿堂,对于这位诗人来说,不可能没有一字半句的诗文道及。考试刚一结

束，他便在十月登上归程，至曲阜孔庙撰有一诗，诗云：“八月飞雪游帝师，栖栖苦面谁相倾。献书懒上公与卿，中朝渐已忘姓名”云云。^⑨结合上述，该诗句应确是有所指的，因为他并没有得到过徐葆光、张照诸人的关照与荐举，颇生人走茶凉的炎凉之叹。以金农所言，其上书帅念祖而辞荐，他确实被人荐举过，只不过是非法度程序，因而不具备合法资格而已。即使如此，这也会被当时的士人，也包括金农，看作是一生中的殊荣。他在自撰的书籍中只是说“遂到都门”、“因赴京师”，而在晚年的书画作品上则径直题以“应试至都门”，显然他知道其间的区别。而他在晚年时公然使门人代笔作画，在作品上说些过头话又算得了什么呢？

在经历了这一次的失望后，金农的“期有所遇”的念头基本上熄灭了。不料在其 76 岁时，即乾隆二十七年，乾隆皇帝第三次南巡时，金农忽然作起了《拟进诗表》和“所业各体诗”，以献媚于皇帝。“期有所遇”之心死灰复燃，此恰是本文所述金农人生态度的一种极佳注脚，也给金农人生中的希冀画上了一个句号。金农没有明白，他所主要活动的雍乾时代，早已不同于康熙时代了。明清史学家孟森先生曾对康熙己未、乾隆丙辰的两次博学鸿词科试，做过这样精辟的区别研究：“己未惟恐不得人，丙辰惟恐不限制。己未来者多有欲辞不得，丙辰皆渴望科名之人。己未为上之所求，丙辰为下之所急。己未有随意敷衍，冀避指摘，以不入彀为幸，而偏不使脱羁者，丙辰皆工为颂祷，鼓吹承平而已。盖一为消弭士人鼎革后避世之心，一为驱使士人为国家妆点门面，乃士有冀幸于国家，不可以同年语也。”^⑩何焯的蒙恩擢拔，与金农的期而不遇，是在这大气候中的典型两例而已。但是，“乾

隆盛世”又给金农这样的失意士人，带来了另外一条生路，那就是以其文化方面的技能和书画专长而谋生。谋生的地点，首选当然是最富庶、消费能力最高的扬州。

金农自南归后，一段时间内主要往来于杭州、扬州间，又曾数度出游，但自 60 岁后则基本定居扬州了。扬州又称广陵，清代扬州著名学者汪中在《广陵对》中指出：“广陵一城之地，天下无事，则鬻海为盐，使万民食其业。上输少府，以宽农亩之力，及川渠所转，百货通焉，利尽四海。”因之，扬州素来为食盐重要产地，并有极发达的城市经济。从明代中叶以后，“贾而好儒”的风气，首先活跃于安徽商人中。至清代，扬州的商人尤以“咸近士风”而著称。也正是从徽商开始，以其财力资助，结交文化、艺术人士，早已蔚然成风，并曾促进江南地区文化艺术的创作活动。扬州的盐商们亦复如此，金农及“扬州八怪”中的其他人物聚集扬州，与此等原因密切相关。综合有关记载，大致可以了解金农在扬州的主要活动。其一，他经常参加大盐商和地方官吏举行的文酒之会，如大盐商马曰琯、马曰璐兄弟在其家园小玲珑山馆举行的宴集，以及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举行的规模盛大的“虹桥修禊”等。在这些宴集上，金农经常以其诗而独领风骚。据《雨窗清意录》记金农客扬州时，“诸盐商慕其名，竞相延致。一日，有某商宴客平山堂，金首坐。席间以古人诗句‘飞红’为觞政，次至某商，苦思未得，众客将议罚，商曰：‘得之矣：柳絮飞来片片红。’一座哗然，笑其杜撰。金独曰：‘此元人咏平山堂诗也，引用綦切。’众请其篇，金诵之曰：‘廿四桥边廿四风，凭栏犹忆旧江东，夕阳返照桃花渡，柳絮飞来片片红。’众皆服其博洽，其实乃金口占此诗，为某商

解围耳，商大喜，越日以千金馈之。”此记颇有故事色彩，其实也是金农靠文才而谋生的手段。据《两浙輶轩录》记金农：“寄食淮扬几二十年，卖文所得，岁计千金。”当然，也就随手做了千金散了。其二，“贾而好儒”的大盐商，除豪尽于声色生活之外，亦好藏图籍、古玩。精鉴碑版、金石、文玩的金农，则颇有用武之地。马曰琯、马曰璐兄弟曾藏有一模拓精良的宋拓《华山碑》，号称“马氏玲珑山馆本”，即是经金农而入藏者。郑板桥尝赠诗金农云：“九尺珊瑚照乘珠，紫髯碧眼号商胡”，就是诗赞金农为个中高手。又据《骨董琐记》中“金冬心”一条记：“盖当时钝丁（丁敬）、寿门，恃买卖骨董为生……儒者治生为第一义，等于自食其力耳。”其三，最重要的当然是靠书画谋生了，扬州民谚曰：“堂前无字画，不是旧人家”，因之对书画有着极广泛的需求，也是导致金农多用门生代笔的重要客观原因。但看来也并非很容易，正像金农在一幅《墨梅图》上题句：“画梅乞米寻常事，却少高流送米至。我今常饥鹤缺粮，携鹤且抱梅花睡。”综上述，我们可以大体了解金农在扬州的生活状况；可以了解，为什么在这段人生经历中，是他最重要、最频繁的书画创作时期，以及颇多代笔的不争之实了。而在其衰暮之年，或因精力不逮，日渐丧失了在这繁华都市中的周旋、生存能力，终于“殁于扬州佛舍”了。

二、书创“漆书”

雍正三年（1725）金农首游京师时，尝有致“培风翰林先生”一札，内云：“吾师义门先生正书品格，洵是国朝第一人，承遗小幅，如获异琛。为门下士者，不特心慕手追其墨宝也。”^⑧

如前所述，其师何焯是当时四大书家之一，必对金农书法艺术产生过影响。虽然过去的时代中，读书人必先工书，然种种迹象表明他的初衷并不以工书为念。在雍正三年中，他又有致“虚舟吏部先生”一札，虚舟即当时另一著名书法家王澐，专擅楷、行、篆书，而金农却对他说：“王右军（羲之）在晋，以骨鲠称，激切恺直，不屑于进用。其议论人事，中病十之八九。所上发粟赈饥等疏，争谏悉不阿顺。宜为晋室第一流人品。奈何其名为能书所掩耳。”^⑩王羲之的著称于世，当然不是他的“骨鲠”，而是书法，然从中恰可以看到金农的态度。他在致王澐的另一札中说：“阿掌院索书小屏，已写完，明日烦僦从送往内城。”^⑪此札至少可以表明两点：其一，金农那时，即雍正三年的39岁时，已是颇有书名，而其作品又为人所喜爱、收藏。其二，这位“阿掌院”即是前面提到的清贵族中文士阿金，雍正初年曾专管掌院学士事，与王澐为文字交。金农为其书小屏，不论是为结交权贵人士以图进取，还是只为解一时的川资之困，总之他是作为一个书法家而登台表现了。由于他的初志不在书法，故其一生书学经历亦多扑朔迷离。正如当代著名书法家、书论家沙孟海先生指出的：“谁都指不出他的师承来。或说他真书学《郑长猷造像》。”^⑫“或说”也就是一种推断，大约觉得有些相像罢了。更有一种看法，因金农擅长隶书，演化出一种形象特怪的书字，名曰“漆书”，因此就用“漆书”涵盖了他的书法。所幸的是，有关金农的书学，尚有一些残编断简的记载。他的书法作品遗迹，自其中岁以后，也还颇多传世，两者结合起来，似乎还可以理出其书法演变、发展的头绪。

先看有关文献记载。厉鹗《樊榭山房集》中记，康熙五十

四年（1715）秋，厉鹗访金农，出观颜真卿《麻姑山仙坛记》，后观金农书法，厉氏有诗云：“堂堂小颜公，颇喜究奇怪。”可知那时29岁的金农，曾学习过颜真卿的书法，但得奇怪之状。这些奇怪之状，是厉氏劝他“勿事征倒薤”。按“倒薤”即小篆书的笔法，收笔作尖锋状，犹如薤叶倒垂状，又名“垂针”。颜真卿的书法，有人评其笔法形状特点为“蚕头鼠尾”，或曰“蚕头燕尾”，波画亦作尖锋状。大概厉鹗不以为然，故赋诗规劝金农。越六年，即金农35岁时，又曾为人跋《麻姑山仙坛记》，则评其书：“结体工整，雅有美度”。看来是他接受了友人的规劝，同时也提高了书法的欣赏能力，重新看中了颜书体整雅美的风轨。这对金农的书法形成是重要的，因为其书法正奄有这种风轨，而“征倒薤”、“究奇怪”，则更出于其天性，为日后创造出“漆书”也埋下了伏笔。康熙五十六年（1717）三月，跋、观《唐拓武梁祠像》，跋中有云：“吾师何义门先生，远留史馆，每寓书问讯，必勤勤眷眷，以未见此为恨。予小子先吾师而展对，一何幸欤！”^②何焯为康熙年间著名书家，书法专宗帖学，却对碑版金石考订颇精，金农的书法不曾从帖学书法入手，当是“夙有金石文字之癖”的结习所致，也是受何焯善于考订金石碑版的影响。正因如此，他对汉隶情有独钟，不仅有深刻的体认，且有独特的见解。雍正十三年（1735）九月间，他为邵阳褚陵作飞白歌，歌云：“我闻飞白人罕习，汉世须辨俗所为。用笔似帚却非帚，转折向背毋乖离。雪浪轻张仙鸟翼，银机乱吐冰蚕丝。此中妙理君善解，变化极巧仿佛般与倭。”^③此诗非常重要，因为是其创造“漆书”之前的理性认识，其年金农48岁。按“飞白书”，南朝宋羊欣《采古来能书人名》中记：“飞白本是宫殿题

八分之轻者，全用楷法。”这里讲的“楷法”，不是楷体法，而是一种隶、楷相参，被称作“八分楷法”的特殊书法，是隶书向楷书过渡时出现的。以今可见的飞白书作品看，最早的还有唐武则天时的《升仙太子碑》的碑额书法，其书确是“似帚却非帚”，即似是用扫帚写出的字，笔画中尽现飞白之迹。金农把那飞白之迹，形容为“雪浪轻张”和“乱吐冰蚕丝”，这只是一诗人之想像。但是“似帚却非帚”，以及“银机乱吐冰蚕丝”，合起来恰似金农日后创造出的“漆书”形象。对碑学书法有精深研究的康有为曾指出：“乾隆之世，已厌旧学，冬心、板桥参用隶笔，然失则怪，此欲变而不知变者。”^⑧在他的不以为然的议论中，恰恰说出了金农在书法史上的艺术的创造性与地位。其一，乾隆之世的已厌旧学，同时在康雍之际碑学书法正在酝酿兴起，金农即其中一人。其二，在碑学书法盛行之际，已经逐步建立了碑学书法的体系，而在此之前的金农尚不可能带着碑学书史的观念去创作，大多则是兴趣所致，特别是对具有诗人性格的金农，尤其如此。因此，他的书法是怪，而非“失则怪”，其中泱然而生的兴趣，又是他人欲学而学不来的。这种兴趣，最开始时是兴之所至，继之则应是有意识的锤炼并凝定于书法表现的形态中。那么，他的兴之所至在哪里呢？尽管金农早期的书作无存，而其存世作品的乍一披面，则已经奠下了其一生书法的基本面貌和格调。兹后的表现，则是一任己为的“究奇怪”，下面具体而言。

行书《游禅智寺诗轴》，应是迄今所见金农最早的书法作品。游禅智寺诗，据该轴书后自识记：“此予辛丑九月同谢奇义、杨海仲、陈授衣游禅智寺诗也。奇义已归道山，海仲羁滞

中州，予与授衣依然落拓作客广陵。于时又值重九，闭门独酌，有怀追录往作，以志予概。”按诗当作于康熙六十年辛丑(1721)，而据金农一生经历，他在雍正元年(1723)五月开始山东等地游历，故该轴书在广陵(扬州)，应是出游前的一二年间，即应是35岁至37岁间的作品。书诗作行体，却有浓厚的隶法、隶意，用笔圆浑，无顿挫锋棱之痕。由此可以看出，“夙有金石文字之癖”的金农，很早便走上了与帖学书法迥殊的艺术之路，他比号称“六分半书”的郑燮更为彻底，也就是不取隶、楷、行相参的折衷之路，干脆地将隶书形态特征的波磔笔画省去，以最适便、适意的形态化为行书一体，倘再加规整，也便成了楷书，是我们最常见的金农楷、行二体书了。

金农有两方书画用章，一曰“己酉以来之作”，可见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金农书轴《司马温公语》上；一曰“娘子关坠马后”，可见于私人藏《六朝名贤轶事册》隶书册上。按“己酉”为雍正七年(1729)，同年金农于娘子关坠马，这两方书画用章，金农使用得并不多，但的确是他作为一种书学经历的标志的。果然，兹后的书法作品骤然丰富起来了。比如其传世名迹隶书《王融传册》、《六朝名贤轶事册》、《张融等传记册》等，皆是雍正七年后一段时间的作品。以本集所收，亦有雍正八年庚戌的《隶书轴》、行书《砚铭册》；雍正十三年乙卯的《隶书轴》等作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作品多是以前贤轶事为书写内容的。其中，书于雍正八年庚戌十月的《隶书轴》，书写前贤“隆冬披纸裘”，而拒绝他人馈赠的轶事。无独有偶，他在《王融传册》后署款“钱塘纸裘老生金农”。这是同年的两件作品，前贤以纸裘御寒，而不接受施舍的高洁行为，正是金农所钦慕和欲仿效的，故自